

形成中的思想

納粹德國教育抉微

——客觀的比較英德教育，

指示今後世界教育趨勢——

斯賓諾梭說：「不要愛你的仇敵，也不要憎恨他，但設法瞭解他」。陶德斯曰：R. Dotts 教授在這本小冊裏，給我們解釋納粹教育的原則與實施。作者首先敘述納粹主義者控制德國普通學校與大學校的方法——如何提大的諾言，如何施行更大規模的「肅清」手段。其次總談到他們的新教育的政治內容。歷史已經成為歌頌「國家社會主義永久真理」的工具；生物學在事實上成為反猶太的科學；數學也退化到受限制。作者於是對納粹主義者所稱，他們的教育制度予人以教育機會的均等一語，加以檢討，並且指出牠的原則，已經在被佔領的各國實施。他的結語是：我們如果想在戰後，使教育不再沾染弊病，必須使我們自己的教育，徹底民主化，學術研究必須不再分國界。

形成中的思想

Minds In The Making E. R. Dods 原著

「不要愛你的仇敵，也不要憎恨他，但設法瞭解他」。要隨時遵守斯賓諾梭這個冷酷的忠告，實在是件難事，在戰時尤倍覺困難。可是這個勸告，却不容漠視，在戰時尤其然。理由有三點：第一、我們要打擊敵人最易受攻的地方。要做到這一點，我們就必須研究他的思想同軍備，並盡力心平氣和地估量這兩方面的實力同弱點。第二、我們要估計到自身犧牲的必要。一個民族遭遇到像英國今天所遇到的危險，就應該絕不誇張地告訴他所抵抗的，到底是什麼，也應盡力探知屈服的代價是什麼。第三、我們要阻止這些危險的復生，而正如一切預防藥品，必須以正確的診斷為根據，換句話說，必須對敵人的思想有真正的瞭解，勿因憎恨或躁急的慈悲幻想而曲解他。

論到教育制度，有五項主要問題需要提出：牠的在那裏？控制牠的是誰？牠所教授的是什麼？怎樣選拔學生？牠是否有效率地進行牠所預定的工作？現在讓我們根

據這點，來討論德國自一九三三年以來施行的新教育制度。我們因為欲獲得客觀的答
案，所以最好竭力以德國官方的資料為根據。

以教育鞏固政權

一九三五年一月五日的教育部公告，曾對新教育的目的，定下了官方的主張：「藉
着喚醒健全的種族力量，同養成青年人具有自覺的政治目標，使家庭裏，家族裏與國家
裏的青年，團結起來」。

其後德國教育部長曾向一位來訪者，用較為明白的言語，闡析上面一段古怪的謔語。
他說：「我們教育的全部功用，就在製造國家社會主義者」（見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三
日人民觀察報）。為確保教育能發揮上項功用起見，整個的教育制度乃於七年之內，從
頭到尾徹底改革。自上而論，如果引用柏林大學校長的話來說，教育的目的就在「消除
過去自由時代的渣滓」，以便產生「國社主義國家內的國社主義大學」。自下而論，如
果引用德國某重要教育家的話來說，初級學校必須成為「國家保護下學習世界透視的
民衆學校」，而根據教育部的概況的言論，中等學校裏合乎人類理想的文化，必須取消

代以「血統與歷史運命所決定之德國人」的理想。

希特勒的信徒並不是最先倡議這種教育理論的人，但是直到我們這個時代，一個大國的元首，才敢向他本國的全體青年這樣說：「國社主義運動陶冶了你們；你們從牠那裏得到制服，你們將畢生爲牠服役。這是一個奇跡：我們的民衆教育已經在你們之中，鍊成連鎖中的最初一環。這個連鎖隨着你們而發端，唯有最後的一個——國人攢入墳墓，連鎖才告終止」。

假如德國的計劃實現了，那麼希特勒所指的那件奇跡——教育，或文藝復興時代以來就已經開始改換歐洲面目的那種偉大解放力量——將於今後變爲鞏固現狀的工具，成爲阻止變化的最有力的保障。連鎖的最初一環，已經在德國青年當中鍊成了，而一六四九，一七八九年，一八四八年，甚至一九三三年的革命動力，俱將於明日成爲新羅馬帝國主義的護符。

教育所受的政治統制

第二個問題的答案，是隨着我們第一個答案而來的。假若今天一個六歲的小孩，純

轉變爲將來政治上唯命是聽的成年人，那麼他祇肯把他所受的教育，託付給一個權威者。這位權威者就是國家，說得確切點，就是國家社會主義的「雅盛納新舊條」中所確定的那個三位一體的神祕怪物，所謂「國家，黨，同阿多夫。希特勒三位一體」是也。這個「新總意志」怪物，若引用希特勒的話來說，「不能把他的青年交給任何人」，而過去七年來的歷史，就是逐步控制，或消除所有獨立教育機關的一部歷史。這裏所指的獨立教育機關，是地方政府，校長與教授，教會，家長聯合會，以及各種自由的青年運動所控制的教育機關。

國家社會主義會逐步圍攻這些潛在的反抗中心。在最初的階段裏，牠盡力施出分化內部的慣技：利用不兌現的諾言，以便在獨立的營盤裏，獲到一塊立足地，並向反抗者施行毀謗，以破壞他們的聲譽。自一九二八年起，希特勒的祕密工作人員，就開始在學生當中活動，允許將來給他們好的職業（好的職業不都是操在猶太人的手裏嗎？）並開始煽動學生反對猶太籍，以及自由或和平主義者的教授。一九三二年，終因各大學當局的怯弱容忍，與勤苦學生對於政治的漠視，遂使國家社會主義者的少數人，幾乎全都控制

代表學生言論的機關，進而利用這些機關來鎮壓一切國社黨以外的呼聲。他們在青年運動中，也採用了類似的策略。新黨爲滿足右翼的理想，就提出恢復國家榮譽的諾言；爲滿足左翼的理想，就提出建立社會正義的諾言，尤特別提出教育機會平等的諾言；爲符合兩方面起見，更表示他們將建立一個新德意志。這個新德意志，將爲青年的樂園，使青年不受家長、校長、同僱主的指使。教會也得到一項諾言，就是「在不危害日耳曼種族生存，及不侵犯日耳曼種族道德習俗的範圍內，國內有宗教信仰自由」（見國社黨綱第二十四條）。希特勒並且允許教會對於教育上的問題，「可以得到發揮適當勢力」的權利（見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希特勒在國會發表的演詞）。這第二項諾言提出以後的第五天，天主教的主教們，就宣佈撤銷其對於國社主義的禁令。

一九三三年而後，提出諾言的方策，每有增補，或代以另一種方策。國社主義同教會衝突經過的故事，要在這裏敘述起來，未免太長，任我們根據一位官方發言人之所言，祇能在這裏說德國全境的教會學校，幾已完全改爲公立學校；初級學校的祈禱儀式，已經取消；講經的時間，也已大減；凡具宗教性質的青年聯合會，幾全部解散，原有的

會員，和十歲至十八歲的所有德國青年一樣，必須加入希特勒青年團。希特勒青年團所發行的教育手冊，把基督教，共濟主義，同馬克斯主義並列爲「盡力求取統治全球」的三種力量，並斥牠們「否認種族，社會，或國家的人的關係，否則就將失去牠們本身的目的」。一些青年運動的殘餘，也在一九三三年被清除。凡具政治性質的青年團體的領袖，俱被監禁或槍決，至於無黨派的自由團體的領袖，則被誘加入希特勒青年團（一九三三年還是採取自由入黨制），而引誘的方式是允許他們獲得「領袖會議」議席（事實上，青年團的領袖會議始終未曾發揮作用）。作者很有理由相信若干團體。仍繼續祕密活動，以迄今日；但是今天假如有人公開散發從前青年運動的舊歌本，就是違法行爲（載一九三九年七月公佈的法令），被查出從事團體活動的人，也會受到野蠻的懲罰。

如何確保以黨統治大學的問題，更爲複雜。第一步是大部根據一九三三年四月七日頒佈的文官任用法，針對大學教授中的一「非雅利安人」同「政治上所不需要的份子」，施行著名的肅清運動。據德國某官吏最近估計，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九年間，因該法及以後補充條例的實施結果，各大學同專科學校的教員，有百分之四十五被撤換。學生

團體也以相似的方式，予以肅清。一九三三年內，約有七千「菲雅利安」籍的學生，因為許多條例實施的結果，而被迫離開大學。同年八月所頒佈的法令，更規定普魯士境內各大學，必須排除「所有持取馬克斯主義者的態度，或反國家態度的學生。凡在言論，著作，或行動方面，對國家運動表示憎惡，或侮辱其領袖者，以及一切和平或賣國團體或相似組織的會員，均在開除之列」。這樣一來，反對政權的政治份子，也被肅清了。這一步完成以後，第二步就是根據權力集中及指派的原則，修改大學的組織法。本來一個德國大學是由大學評議會，教職員大會，同一位每年公選的校長管治的（校長的職位，可比於牛津劍橋的副校長），現在則由政府所推薦的三個人管治：一位是校長，一位是教師方面的黨組織代表，一位是學生方面的黨組織代表。他們的任期都是無限的。教務長，校長，同大學評議會的其他評議員，也由校長指定，教職員大會則降居顧問委員會的地位。最後，因為恐怕「政治上所不需要的份子」，又有一天潛入大學，所以教師的自聘權，也被剝奪了。根據最近的決議案（見一九三九年三月三日教育部公告），所有大學教師（不僅以前所規定的教授），今後均為公務人員，由教育部任命，未經教育

部許可，不得從一個大學轉入另一個大學，但教育部却可以（事實上也已經如此）未得他們的同意，就把他們調動，和調動其他官吏一樣。

普通學校也採取相同的步驟。普通學校較大學，尤容易落網，因為邦政府早就對牠們實施頗為嚴密的統制，而普通學校的校長，自一八七二年以來，就已經列為公務人員，不能享有像大學教授所傳統享有的學術研究自由權，（雖然共和時代的聯邦政府，大體上也曾鼓勵個人的創造力，並以良好態度對待一般實驗學校）。可是希特勒的信徒是不肯做倖從事的。一九三三年二月，教育部長就已經決心，「以其職務上所需要的一切殘忍」，消除初級學校中所有「非日耳曼性」的事物同人。同年七月，教師們又接到警告，要他們同社會民主黨斷絕一切或有的關係（當時無數的初級學校校長，都加入這一黨），並且必須熟識「我的奮鬥」一書裏的原則。這一年年底，特別委員會曾把十六萬名教師的政治調查表，加以研討，有許多教師遂被開除，其餘的教師，則由國社主義教師團，授以政治訓練。這個國社主義教師團，歸併了所有舊有教師組織，但牠的目的，不在保護職業上的權益（公務人員採取集體討價還價的行動，早已禁止），而在「教

育全體教師。使具有共同的國家社會主義觀念」。牠爲達到這種目的起見，特設立「教育營」，規定所有教師必須入內受訓。自初級學校以至大學的每一個教師，必須盡忠希特勒，而中等學校的任何職工（法令中特舉出女校役同火伕爲例子），必須書面聲明自願遵守國社主義國家的法律。這個國家竟如此謹慎地保衛自身，以免沾受污穢。

其他可能成爲反抗活動中心的地方，也同樣使其納粹化。學校圖書館裏肅清了猶太人的著作，讚揚猶太人的書籍，不能向日耳曼民族或北歐民族表示應有尊敬的書籍，以及「非日耳曼派態度」的等等書籍（見一九三八年三月三十日福蘭克福特日報）。學校圖書館購買的，必須限於教育部認爲「適當」的書籍。

一九三四年五月，全國獨一的教育部，宣告成立，因而消除了各邦自創教育制度的可能性（在共和時代就有這種情形）。束縛德國兒童的鍊圈，至是全部告成。他的身體同靈魂，俱屬國家。國家同黨是一體，而黨同希特勒也是一體。其他任何人俱不許觸犯他。

新教育的政治內容

從字面上看，一個德國初級學生的課程，很像英國初級學校的課程，祇是前者的課程同上課時間，要由教育部規定，而我們則聽任各校自行選擇。中等學校的情形，大體上也是如此。可是經過一番更仔細的審查，就可以發現一些罕有的特點。其中之一就是生物學在各種中等學校裏，被列於必修科的地位，自最初級以至最高級的學生，都要修讀。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三日的法令規定「在必要時，不惜犧牲算學同外國語文課程」，以便教授生物學。其後（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五日）又有一道法令，對此加以下面的解釋：總理下令「任何青年男女，凡未能充份瞭解血統純潔的性質與必要，不得出校」。於是生物學所必須教授的課目，就是官方所確定的下面一些課目：「血統純潔的保持；種族雜交的危險；猶太人問題；寧謚法律；與國社主義的觀念與法制所完成的種族改革」。說得明白點，「生物學」變成了反閃族主義（反猶太觀念及思想）的必修課程。

其他使人發生興味的特點，是主要的外國語中，已取消了法文，專門教授希臘文的學校，在數目上也有迅速的減少。在共和政府時代，各種學校都有各種語言的綜合教程，至於英法兩種主要近代語言，則必須任選其一。但是自一九三八年以來，英文成為各

統的必修科，拉丁文在所有男學校中，也是必修科，而法文則成爲選修科。在中學的最後三年當中，或者可以有幾小時的法文教程，這種情形，或許映示希特勒相信具有「黑人特性」的法國文化，已經沒有前途了。專門製造未來政治家同外交家的阿多夫·希特勒學校，自一九三九年以來，就把英文同義大利文列爲必修的兩種近代語文；德蘇協定簽後，中等學校同大學又鼓勵學生學習俄文，這都是很堪重視的。古文中學校仍有希臘文的教程，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頒佈的法令，使這一類學校的數目，大行減少——一九三七年的時候，普魯士境內就已經從二百七十所，減爲一百零九所，烏得坦堡境內原有四十九所，也減爲三所。女子教育方面，已不再有希臘文的教程——拉丁文的教程也不多。在德國一度受到特別尊嚴的古典學術研究，事實上似乎已在中學同大學裏，進入消滅的過程。一九〇〇年，全體中等學校校長中，祇有三分之一強，具有通曉古代文字的資格；到了一九三九年，合格者祇占百分之十五，至於試讀學生中，合格者還不到百分之八。一九三五年，全德國各大學裏，祇有三百八十名學生列居古代語文專家的地位。尚不及牛津大學一個學校裏的數目，比起五年以前的數目，尚不及三分之一。

比課程的改變更重要的，就是教學精神的變更。以前德國流行一句話：「所謂合乎日耳曼的性格，是指爲本身設想而做一件事」，在今日的德國，尤其在德國學校裏，却沒有一件事是爲本身而做的。每一種研究必須對學校的「政治工作」有貢獻，而學校的政治工作，就是「以國家社會主義的永久真理，介紹給青年人，並教育他們養成嚴毅的國社主義的生活方式」。這種工作，開始於初級學校，那裏所用的，是全國一律的新課本，其中含有「我的奮鬥」和其他具有法典性的國社主義著作的撮要。在中等學校裏，政治工作則發揚于最想不到地方。「教育部手冊」通知教師在講解德國文學的時候，應該隨時以種族原理爲中心；講授地理課程的時候，必須「就國社主義者的精神，加強聽者接受政治思想行動的決心及能力」。化學教師除了向學生解析氣體同炸藥的軍事用途外，還要說明「日耳曼人，尤以北歐日耳曼人對於化學研究的有力貢獻」。選擇古代文學課本的標準，也不應該像從前一樣，選出那些「以歷史文化或審美立場爲主要根據」的著作，而應該選擇能夠「表現北歐日耳曼人所具的相似特質」的著作（這也就說明爲什麼教程中有齊諾峯所著的斯巴達憲法，同史多紐的奧格斯達傳，而反沒有攸里比特斯

，底摩斯塞尼斯，卡杜魯斯，魯克里底斯。同。奧維特的地位）。生物學以外，對政治工作最有幫助的課程，自然是近代史。現在初級學校的第五年級和中學校的第五及第八年級，完全教授近代史（自俾斯麥到希特勒）。官方所規定的中學教程裏面，有的是「俾斯麥保護德意志反抗羅馬教同民主主義者的虛偽」，「共濟會社的擴充同教會對猶太人受洗禮所取的態度，如何增加猶太人同日耳曼人血統的混雜程度」，「世界大戰期間德國舉止的崇高性」，凡爾賽（這一項內容，講解極為詳細），「讀職荒淫腐敗的魏瑪共和國」，「馬克斯主義者同資本國際的盟友——政治性的天主教」，「希特勒解放德國綏靖歐洲」等等。此外，德國兒童也要不斷聽取政治講話——或利用廣播，講解「生存空間——與寧堡的「國社黨黨日」，或利用演講隊，講述「黨與國家」以及挺進隊的發展，或利用希特勒青年團的「晚會」，講述「日耳曼人的德國」與「德意志的團結」。一個兒童決無法逃避這一切，不論他如何討厭牠們。他的眼耳或者也被聯結在一起，因為他還得遵守法令（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六日頒佈），每年至少四次自己拿錢看「國家政治影片」。

也許他入了大學以後，情形就不同吧？其實並沒有十分的區別。在中學時代，他是希特勒青年團團員。現在他是挺進隊員，因為引用斯忒甫爾博士的話來說，「德國大學中沒有一個人居於不恥爲挺進隊員的地位的」。他除了接受挺進隊的操練外，還得至少有三學期的強制性的戶外運動訓練。受訓的時候，特給予積分，假若積分不夠，或者操練不力，就有被開除可能（見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八日頒佈的命令）。國社主義學生團把「觀念政治教育」灌輸他們；這個學生團代替了舊有的學生團體（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期間，自從海德爾堡某貴族團體的團員大聲討論「總理吃蘆筍的樣子」以後，舊有的學生團體，就被禁止）。其次，今日的學生已不能像從前一樣，享有自由選擇課程權。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八日頒佈的命令，規定第一年級的學生，必須修讀有關「種族與部落，人類學，史前學，以及日耳曼民族的政治發展歷史，尤其百年來日耳曼民族的政治發展史」等等課程，俾能熟知「魏森沙哈特的種族基礎」。這些課程大都載列入新的講座，名稱也很奇特，如「民族性社會學」或「家族與家庭研究」。一九三六年海德爾堡大學的重要課程，都是一些論到民族與種族，德國古代宗教性質，德國猶太人的歷史，

國社主義哲學根據，國社主義哲學與種族原理等等的課目。學生是否能夠從這些課目中，得到心得，也要在以後加以致驗。假如他應赴政府舉辦的師資攷試，那麼攷試官就要提出「政治觀念的基本問題」，向他詳加考問（自一九三七年以來，這種考試制度，代替了以前的哲學口試）。假如他完成了一篇考取大學博士學位的論文，那麼他就要遵照一九三九年一月九日的法令，把論文提交「保護國社主義文學黨考核委員會」，請求通過。設使委員會發現文中有非正統派的「政治觀念」痕跡，就可以令其修改，或禁止發表。瑪秀·阿諾爾德於一八七四年在文章裏寫着：「法國的大學沒有自由，英國的大學沒有科學，德國的大學却具備兩樣」。其實上面所說的，才是阿諾爾德眼裏的學術中心，對於學術自由所取的現有觀念。

機會均等？

在整個十九世紀裏，兩種教育制度在歐洲並行發展。其一是富人教育，從私立的預備學校開始，一直到公立學校，中等學校，以迄大學爲止。其次是平民教育，牠的開始